

云南三线建设的战略定位与历史回响

马颖娜

战略定位：边疆腹地的双重使命与布局逻辑

云南在三线建设中的独特地位，源于其作为西南边疆和连接南亚东南亚门户的双重地缘属性，兼具“国防前线”与“战略后方”的双重使命。

1964年，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国家启动三线建设。云南依据战备需求，将全省划分为三级区域：文山、红河等35个边境县为“一线”，承担前沿防御；昆明等41个县为“二线”，发挥中转枢纽作用；滇东北、滇西北58个县为“三线”纵深处，集中布局战略工业。这一“前沿—纵深”的立体布局，覆盖全省70%以上县域，形成了清晰的战略空间框架。

在西南三线建设的整体布局中，云南承担着交通枢纽与资源供给的双重核心功能。贵昆铁路（1966年通车）与成昆铁路（1970年通车）的建成，打通了云南与内地的交通命脉，结束了云南铁路“不通国内通国外”的历史。同时，云南丰富的锡、铜、铅锌等矿产资源得到重点开发，个旧锡矿、东川铜矿等成为全国三线建设的关键原料基地。1964年至1980年间，云南三线建设累计完成投资150.95亿元，虽规模不及四川，但其交通与资源战略价值突出。

三线建设深刻改变了云南的经济社会面貌。通过国家力量系统性植入现代工业体系与技术，云南实现了从农业主导向工业化的历史跨越：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由1952年的12.5%提升至1980年的50.5%。此外，数十万来自沿海和内地的建设者迁入云南，带来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促进了多民族交流与边疆社会进步，为云南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阶段演进：从交通筑基到军工深耕的建设脉络

云南三线建设历时十七年，依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呈现出从交通筑基、军工深耕到调整转型的清晰阶段特征，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建设历程。

第一阶段（1964—1969年）以交通建设为核心，夯实工业发展基础。本阶段以“若要建，先通路”为核心理念，全力攻坚交通命脉。成昆铁路与贵昆铁路是重中之重。成昆铁路穿越“地质博物馆”般的横断山脉，建设者在极端艰险条件下开凿隧道427座、架设桥梁991座，于1970年全线贯通，堪称世界铁路史上的奇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下，一场规模宏大的战略性工业迁移在中华大地展开。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凭借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和资源禀赋，成为全国三线建设的重要承载区。历经十七年建设，云南构建了以交通为动脉、以国防工业为核心、以资源开发为基础的工业体系，深刻改变了边疆经济社会面貌。本文从战略定位、阶段演进、地理烙印和历史回响四个维度，系统梳理云南三线建设的历程与特征，分析其对区域生产力布局、工业化进程和空间结构的深远影响，并探讨其工业遗产和精神财富在当代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启示意义。

迹。贵昆铁路则于1966年提前通车，标志着云南铁路首次与全国路网贯通，实现了交通格局的历史性转变。同时，昆明钢铁公司完成扩建，由上海支援技术设备，奠定省内钢铁工业基础。此外，一批公路、水利及国防公路同步建成，初步构建起支撑工业发展的基础设施网络。

第二阶段（1969—20世纪70年代中期）转向国防工业集中布局，形成“靠山、分散、隐蔽”的建设格局。随着珍宝岛事件后战备压力升级，建设重点转向国防工业。六机部在云南布局了涵盖10个工厂、1个研究所和1个试验场的完整鱼雷研发生产体系，分散于曲靖、楚雄等深山中。航天工业方面，国营西南长征机械厂（5042厂）在楚雄禄丰建设，专攻防空导弹设备。这些企业汇聚沿海技术精英，在封闭艰苦环境中攻坚克难，推动云南工业结构向高精尖国防领域倾斜，至1975年军工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比重达18.7%。地方兵器和电子工业同步发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国防生产链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进入调整巩固与转型萌芽期。国际局势缓和后，三线建设重心转向配套完善与技术提升。1976年至1980年间，约42%的投资用于技术改造与配套工程。军工企业率先探索“军转民”，如解放军七四三厂转型生产茶花牌汽车，西南长征机械厂利用军工技术制造兰花牌冰箱，畅销一时。这些实践不仅改善了企业效益，也为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转型积累了经验。1978年后，随着国家工作重心转移，三线建设逐步收尾，但其奠定的工业基础、技术体系和人才储备，成为云南后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地理烙印：战备逻辑下的工业布局与空间遗产

三线建设遵循“靠山、分散、隐蔽”的

战备原则，在云南形成了独特的地理布局，对区域空间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散落深山的珍珠”：嵌入山区的工业布局，为满足战时安全需求，许多重要工厂被布局在偏远山区。例如，生产鱼雷的国营西南云水机械厂（5012厂）位于曲靖马龙的群山之中，制造导弹部件的5042厂隐于楚雄禄丰密林，其通讯地址仅为“昆明724号信箱”。这种布局虽保障了战备安全，但也带来企业协作困难、物流成本高昂及职工生活不便等问题。然而从长远看，它将现代工业文明直接植入落后山区，客观上促进了生产力的空间均衡分布，为后续的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历史铺垫。

资源与交通驱动的集群发展。三线工业布局与本地资源禀赋深度融合，形成了特色产业集群：滇南围绕个旧“锡都”形成锡业及相关配套产业群，锡产量占当时全国90%以上；滇东北以东川铜矿、会泽铅锌矿为核心，成为国家重要的铜生产基地；昆明周边则集聚了机械、冶炼等产业，形成四大工业区。同时，成昆、贵昆铁路作为两条关键发展轴，带动沿线城镇（如曲靖、楚雄、玉溪）迅速发展，从农业聚落转型为工业节点，初步构建了云南“点轴发展”的工业空间框架。

“厂社二元”结构下的城乡互动。三线建设形成了独特的“厂社二元”社会空间：围墙内是配套齐全、人员来自全国的现代“单位社会”，围墙外则是传统的乡土农村，二者虽相对隔离，但也产生了实质性互动。工厂建设推动了当地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改善；企业通过采购农副产品、开展“厂社结合”试点（如提供技术、兴修水利），带动了周边乡村发展。这种国家工业力量与边疆乡土社会的碰撞与融合，为理解城乡关系演变及探索协调发展路径提供了历史经验。

历史回响：三线遗产的当代价值与区域联动启示

云南三线建设留下的物质与精神遗产，对当代区域协调发展仍具重要价值与启示。

三线遗产的当代价值。三线建设通过国家力量推动生产要素向中西部地区战略转移，为区域均衡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全国三线建设期间累计投资超2000亿元，显著提升了中西部工业实力。云南通过“三老带三新”等模式，实现了技术、人才与经验的跨区域转移，培育了本土化工业能力。这种“能力建设”效应，为后发地区工业化提供了重要范式。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成效显著。昆明“871文化创意区”、曲靖云水机械厂旧址等通过文旅融合与创意开发，实现了从工业遗址到文化空间的转型，既传承了历史记忆，又创造了经济价值。

对区域联动发展的三维启示。在要素流动层面，应借鉴三线时期国家主导的要素配置经验，在市场化框架下进一步打破行政壁垒，依托既有及新建交通网络（如中老铁路），完善跨省物流通道，促进人才、技术、资源的高效流动与共享。在产业协同层面，可延续“资源—产业”的耦合逻辑，推动西南各省区形成差异化分工。例如，在有色金属领域共建新材料产业联盟，实现从原料到精深加工的协同；整合区域三线工业遗产资源，共同打造跨省红色旅游与工业旅游线路，形成文旅产业联动格局。在空间优化层面，需强化“通道—节点—网络”的联动发展逻辑，既要升级传统交通干线，也要依托新通道培育产业节点城市，推动滇中、滇东北、滇西等区域形成特色产业集群。

云南的三线建设是一次深刻的国家战略实践，它以巨大的投入和牺牲，在边疆地区构筑了工业化的“钢铁长城”，重塑了云南的发展轨迹。其留下的不仅是厂房、铁路等物质遗产，更有跨越时空的战略智慧、发展能力和精神力量。在新时代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回顾这段历史，汲取其“全国一盘棋”的协作精神、因地制宜的布局智慧和艰苦奋斗的创业意志，对于书写中国现代化史上的云南新篇章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献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系2025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三项访学计划”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南侨机工抗战书信中的家国情怀

庞申伟 雍荏苒

习近平总书记在马六甲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提到“80多年前，马来西亚南侨机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奔赴云南，帮助打通滇缅公路这条生命线”。南侨机工的全称是“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众多响应祖国号召的优秀南洋华侨青年所组成，他们抛家舍业、毁家纾难，成为近百年来华侨史上一次最有组织、影响最为深远的爱国主义行动。抗战期间南侨机工与家人、朋友或组织之间有大量书信往来，字里行间充满着捍卫疆土、抗击侵略的拳拳报国之心、殷殷爱国之情，成为带有信仰温度的“爱国绝笔”，是海外赤子用生命书写的家国史诗。充分挖掘南侨机工抗战书信中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涵养家国情怀、传承革命精神，对于永续传承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奋勇抗争的民族基因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外的陈嘉庚铜像。 本报记者 陈飞摄

爱国之情：家与国的抉择

1939年，随着我国沿海港口相继沦陷，滇缅公路成为唯一国际运输通道，却面临驾驶员与技术人员短缺的困境。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身份发布通告招募机工，其中特别要求应征者“确具有爱国志愿”。三千余名爱国华侨青年随即响应号召，归国投身抗战运输，成为这条西南生命线上的重要支柱。

槟城华侨白雪娇出身南洋富商家庭，她瞒着父母报名成为一名南侨机工。临行前，她在留给亲人的家书中写道：“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她坚信“能替祖国做点事，就觉得此生无负于祖国”，这份“舍身而

不顾，毁家而不怨”的誓言，正是千万爱国侨胞奉献精神的缩影。

机工刘瑞齐同样隐瞒家人回国参战。得知妻子因思念成疾，他在家信中写道：“中国抗战一日未胜利，我就一日不能回去！”字里行间尽显华侨赤子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崇高抉择。

在滇缅公路执行任务期间，机工张智源接连收到两封家书：先闻父病危，后告父已丧。面对紧急运输任务与家庭变故，他毅然选择坚守岗位，将悲痛化为紧握方向盘的力量。正值其叔公在家书中所勉励的：“为民族谋解放，跃万里赴司机”。这一抉择不仅是个人牺牲，更承载着华侨群体对民族救亡的共同托付。

报国之志：生与死的考验

滇缅公路沿途山高谷深，地势险恶，道路崎岖，加之敌机狂轰滥炸，路塌桥断，枪林弹雨，漫漫运输路程可谓险象丛生。每一位机工在千里滇缅公路上都要面对“山高河多路险关、雨天泥泞塌方关、路窄车多摩擦关、瘴疠疟疾夺命关、抛锚无援饥寒关和日夜寇轰炸任务未完身先死关”，这几道“鬼门关”共同构成了对南侨机工生存意志与技术能力的重要考验，其工作环境的艰险卓绝，在世界战争后勤史上亦属罕见。

面对如此艰难险阻，南侨机工始终心怀报国之志。第三批回国的机工陈逸曾写道：“是谁使我们这样吃苦的呢？很明白，是敌人。”他们将艰苦淬炼为对侵略者的痛恨，并转化为坚持抗战的精神力量。

1942年惠通桥炸毁致败，机工骆

显祖在寄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待抗战胜利，山河重光再回家乡团聚……”这封寄望团圆的家书，最终成为他生命的绝笔。新加坡机工许志光为回国抗战，毅然将家人送回故乡，其奉献精神获得陈嘉庚先生的亲笔赞扬。

在千里运输线上，南侨机工秉持“情系中华赴国难”的担当，以“一个华侨能出力，十个敌人九不回”的豪情，在枪林弹雨中坚持运送战略物资。机工刘孟兴的母亲在信中勉励儿子“将身体贡献于国家”，友人也写信鼓励白清泉“中国不会亡，抗战到底”。正是这份来自亲人的嘱托与坚定的爱国信念，使他们的牺牲超越了个人意义，升华为群体共赴国难的精神史诗，为抗战筑起了一条“打不垮的钢铁运输线”。

强国之行：去与留的担当

抗战胜利后，南侨机工面临着返回南洋或留华建设的人生抉择。其中一部分人怀着对曾以热血守护的土地的深厚感情，毅然选择留下，投身于战后的国家重建。

他们将在抗战中锤炼出的驾驶、维修等专业技能，奉献给百废待兴的祖国。有的投身西南交通建设，修复战争创伤；有的扎根滇缅沿线，参与地方经济复苏与民生改善，为边疆发展注入国家重建。

机工蔡罗选择留在云南建设，却因战时旧伤复发不幸早逝，报国志未竟。其岳母家书中“切勿久恋他乡”的叮嘱，背后是家庭期盼与华侨报国情怀的深沉交织。

印度尼西亞机工陈寿全收到复员通知后，最终选择留在重庆的冶炼厂继续奉献。抗美援朝期间，他更捐出全部积蓄，并教育子女：“买飞机大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展现出将个人命运与国家需要紧密相连的担当。

据统计，战后约三分之一的南

侨机工选择留在国内。新加坡机工陈金福辗转多地参与建设，他曾表示：“国家需要之处，便是我们奉献之处”。这份抉择，正是海外华侨与祖国命运与共的生动写照。他们以血肉铸就抗战丰碑，以汗水浇灌建设事业，其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宝贵力量。

1934年底，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再会吧南洋》（又名《告别南洋》）在南洋地区广为传唱：“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血流淌着黑龙江？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唤醒与激励着一代南侨机工告别南洋赴国难。在南侨机工群体为民族存亡的殊死搏斗中，为祖国建设的无私奉献中，满怀赤子之心的南侨机工永远与祖国同频共振，书写他们伟大卓绝的家国情怀。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本文系2023年云南省兴滇人才计划项目“云南重大先进典型宣传教育赋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研究”的研究成果】

李根源“中国各族一体”政策探究

王俊溪 余正红 李有文



李根源故居 作者供图

辛亥革命前后，云南作为西南边陲多民族省份，其革命实践与民族政策具有独特意义。1911年11月1日，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后颁布的《施政纲要》明确提出“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一体之国家”，首次系统阐述了“中国各族一体”的民族政策。这一政策的形成与推行，与云南军政府重要领导人李根源的推动密不可分，李根源生长于多民族杂居的滇西地区，对民族问题的深刻洞察与实践经验，为这一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各族一体”思想的渊源溯与个人背景

李根源提出“中国各族一体”的主张并非偶然，而是云南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晚清民族民主革命思潮的传播及其个人成长经历共同作用的结果。

云南长期多民族杂居共处的社会格局，孕育了民族和睦共生的历史经验。近代以来，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持续不断，特别是杜文秀大理政权提出的“连回汉为一体”等政策主张，尽管存在历史局限，仍为地方民族关系的处理提供了重要参照，对后来云南军政府的民族政策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20世纪初，李根源作为留日学生中

的代表人物，并未简单照搬外来理念，而是立足于云南多民族交汇的边疆现实进行深入思考。其家乡跨越九保地处滇西边陲，汉、傣、阿昌等多民族在此共同生活，使他自幼对边疆民族的社会文化具有深刻体认。这让他能够超越当时部分革命党人“排满”的狭隘民族观念，形成更具包容性的视野。

基于对边疆民族地位与作用的清醒认识，李根源提出“土司守土，历数百年，巩我藩篱，皆吾邦族”的“邦族”观念。这一观念强调，世居边疆的各民族与内地民族同属国家共同体，是守护疆域、巩固边防的重要力量。这为其系统形成“中国各族一体”的进步民族思想奠定了重要的理论与情感基础。

“中国各族一体”政策的内涵与对时局的超越

云南军都督府的“中国各族一体”政策，是在辛亥革命进程中对民族问题认识的深化和飞跃，其内涵深刻，并在多个层面超越了当时的其他主张。

在革命初期，以“驱逐鞑虏”为代表的口号虽具动员力，但带有明显排满倾向。云南军政府领导人李根源等人迅速

认识到，这种狭隘民族观不利于国家统一与边疆稳定。李根源明确提出：“此次建义，实以扫除专制，改造民国为职志。此固政治之革命，不杂种族之问题”，从而在思想层面完成了从“种族革命”向“政治革命”的关键转变，为形成更具包容性的民族政策扫清了障碍。

相较于南京临时政府提出的“五族共和”，“中国各族一体”更全面地回应了中国多民族并存现实。李根源等人基于对国情的深入了解，主张各民族“共息于中国者，皆中国人”，云南军政府的政策文件因而明确将西南边疆各民族平等纳入国家建构的视野，这不仅扩展了民族代表的范围，更体现了对中华民族构成复杂性的深刻把握。

该政策的核心在于“一体”与“多元”的辩证统一：“一体”强调共同构建统一不可分的中华民族国家，培育共同的政治认同与命运意识；“多元”则主张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尊重各民族在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保障其平等权利与义务。这一思想与后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高度契合，展现了超越时代的预见性，为理解中华民族作为复合民族实体的内涵提供了早期